序 言

在《大學何為》的「自序」中，我談及自己的工作目標——從歷史記憶、文化闡釋、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，思考「大學」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，是什麼、有什麼、還能做些什麼。這個工作的起點，說晚點，從1998年出版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和《北大舊事》算起；說早點，則可追溯到1987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〉，其中一個基本判斷，對我日後的學術道路影響深遠：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沒有『新教育』，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，也沒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。」

將近二十年前，我曾有〈書裏書外話「大學」〉的「答問」，刊2007年10月28日《出版商務週報》第22、23版，日後改題〈我的「大學研究」之路〉，作為港版《歷史、傳說與精神——中國大學百年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9）及京版《大學有精神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的代自序。文中有這麼一段話，現在看來依舊不過時：

> 我曾經說過：「從事學術史、思想史、文學史的朋友，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。因為，百年中國，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，乃值得大書特書的『關鍵時刻』。而大學制度的建立，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，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，更是帶根本性的——相對於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移而言。」反過來，教育史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・真古版權所有資料

的思考與撰述，對我從事文學史或學術史的研究，大有裨益。這一番「遊歷」，在我已出版的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》、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等書，以及正在撰寫的《作為學科的「文學史」》中，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

正因此，談論我的文學史、學術史、文化史研究，必須顧及我對教育制度及大學精神的關注；反之亦然。202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24卷《陳平原文集》，文學史、學術史、文化史、教育史各佔五卷，真應了那句「四樑八柱」的老話。

與我的文學史、學術史、文化史著作以專著為主大不一樣，我的大學著述，兼及論文、隨筆與答問等。我自己反省：之所以長槍短棒、匕首彈弓一起上，一是兼及歷史與現實，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（教育）改革，二是思考尚不成熟，為文略嫌匆促。沒能寫出沉甸甸的專著，當然是很大遺憾；但卸下了學問的盔甲，直面當下，暢所欲言，未嘗不是一件快事。

我明白，魚與熊掌很難兼得，這個選擇，曾仔細斟酌，並公開陳述——

2009年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增訂版「後記」稱：「研究的策略與敘述的筆調——兼及『文』與『學』，將歷史研究的探索與寫作方式的革新結合起來，這是作者小小的夢想；不是專業著述，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散文隨筆，而是半學術半文章，姑且稱之為『第三種筆墨』。」

2015年〈「大學五書」· 小引〉有：「我之談論大學問題，縱橫文學與教育，兼及歷史與現實，包容論著與時評，如此思路與筆墨，說好聽是『別有幽懷』，說不好聽則是『不夠專業』。好在我不靠這些文章評職稱，故不太在乎學院派的態度。」

2024年〈我的教育理念及實踐〉說：「我談大學各書，論文與隨筆、雜感、演說混編，而不是將學術專著與隨筆集分開出版，這裏包含我的獨特考量——中國那麼多綜合大學或師範大學，都設有教育學院，兵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· 具有版權的資料

強馬壯，糧草充足，要找專精的個案研究，或漫天撒網的社會調查、對症下藥的政策建議，說實話，不缺我一個。我的特長是兼擅史學的立場、批評的眼光、建設者的姿態、散文家的筆調，有興趣也有能力面向公眾發言。而且，既不申請課題，也無發表壓力，更不看領導眼色說話，這樣的論述姿態，或許也算獨一份。」

這本《大學的讀法》是我近三十年大學論述的「精選集」，內容上強調「大學之道」，注重中國經驗，在與歷史的對話中，展開「大學文化」以及「教育理念」的思考與實踐，文體上則依舊保留此特點，兼及論文與隨筆。全書分「如何閱讀大學」、「老大學的故事」、「當代中國大學的路徑」、「人文學的前景」、「八面來風說大學」等五輯，收文34篇，外加一則附錄。最後一輯是隨筆與雜感，接近魯迅所說的匕首與投槍；前四輯學術性強些，但也不全是專業論文。各文兼及大局與細節、史實與理論、考證與闡釋、嚴謹與趣味等，但在學術功力與問題意識之間，明顯傾向於後者。

談論的對象是「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實踐」，為何書名「大學的讀法」？與清初文學批評家金聖嘆的「《水滸傳》讀法」不同，這裏強調的不是筆墨技巧，而是如何將「大學」作為一種教育形式、一種社會組織、一種文化精神，仔細地閱讀、欣賞、品味、質疑。在〈閱讀大學的六種方式〉（《解放日報》，2009年2月9日）中，有兩段話值得推薦：「我所理解的『讀大學』，不僅要學具體的專業知識，還要研究生產這種專業知識的機構和機制。這樣，你在大學期間所學的知識，才是鮮活的，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」；「正是這種參與感與憂患意識，這種兼及理想性與可行性的大思路，使得我在談論大學時，不同於一般教育學專家，也不同於充滿道德訴求的『憤青』。或許不夠專業，但很可能元氣淋漓。」

作為全書附錄的〈我的教育理念及實踐〉，是我2024年10月24日在西交利物浦大學主辦的「尋找新時代中國傑出教育家」的自我陳述（日後正式獲獎），其中開列自家有關教育的圖書：在中國大陸出版十一種、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・具有版權的資料

在中國台灣出版六種、在中國香港出版三種，另外，還有兩種談論「大學」或「中文系」的隨筆集。表面上洋洋灑灑，規模很可觀；可我心裏明白，如此分散精力與筆墨，不利於著作的傳播。這回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邀請，編一冊大學論述的精選集，可謂正中下懷。

去年11月，我在「慶祝中山大學100週年大會暨創新發展論壇」上發表主題演講，提及「隨着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，對於古老的以傳授知識、培養人才為己任的大學——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學，構成了巨大挑戰」;「我的直覺是，我們正面臨『大學』這一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」。此時此刻，重讀多年前的舊文，感嘆很多老話題(如大學之道的扭曲，以及大學精神的失落)沒有解決，很多新思路(如人文學的突圍，以及直面科技革命的挑戰)尚未充分展開，故集結舊部重新出發，顯得尤為必要。

談論中國大學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三十年間，我的基本立場沒變，但因應時事的遷移、學界的成長，以及個人心境的沉浮，會有若干調整。因此，各文均註明原始出處，且保留初刊時的風貌，不做任何修飾與刪節(包含若干重疊的地方)，目的是顯示個人學術思路的演進，同時也體現大環境的變化。字裏行間，有心人不難體會那些「壓在紙背的心情」。

2025年8月3日於內蒙赤峰旅次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·具有版權的資料